



游击学校

张麟 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游击学校

张 麟 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·1965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书里有“游击学校”“母女俩”“白大姐”“春”“下山”五个短篇小说。这些小说都是描写抗日战争时期，抗日联军的战士，在紧张的战斗中，在艰苦的环境中，不怕困难，坚持斗争的故事。这些小说不仅告诉了我们抗日联军战士们，在深山密林里生活、学习、战斗的情景；而且为我们描绘出革命战士的英雄形象。他们那种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，对祖国对人民忠心耿耿，对敌人毫不含糊斗争到底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
游 击 学 校

张 麟 著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168 1/32 2 7/8 印张 44千字

1965年6月北京第1版 196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,000 定价(2)0.20元

目 次

游击学校	3
母女俩	24
白大姐	40
书	56
下山	76

游 击 学 校

你問我进过什么学校：“游击小学”、“青山大学”。这就是我的母校。沒有漂亮的校舍，沒有油漆光亮的課桌。甚至也沒有一块黑板。喧响的柴林是課堂，嘹亮的軍号是上課的鐘声。……

七岁就到了上学的年龄，可是，我长到十二岁，还没见过学校是什么样子。爸爸和爷爷都是猎人，我也扛起了猎枪，跟着进山去下套子，捉黑熊。

这一年春天，跟爸爸进山回来，小妹妹咪咪瞪起黑亮的小眼，神秘地向我說，“哥哥，往后你別跟爸爸进山了，好上学了。听爷爷說，咱俩都去念书哩！真的，不騙你，快去看看咱的学房吧！”她扯着我跑向屯子的东头。

先前垛包谷秸的地方，盖起了三間小馬架子房。房

頂披的是山上的黃麥草，四面是粗粗巴巴的山榆柱子。地上堆着坯塊、木板、泥土、麥糠(róng)。四周的牆一堵，這學房真的就成了。咪咪坐在一羅坯塊上，兩手背着，一本正經地說：

“爺爺說，做學生，得先學會坐，頭不興歪，腰不興彎，真的！”小妹是愛瞌睡的，天一黑就爬炕，白天也好打盹，奶奶總說她是磕頭蟲變的。今兒精神得象另一個人了。又向我說：“哥哥，往後不興喊我磕頭蟲了。一上學，俺就不困了。真的！听爺爺說，做學生都興喊大號，喏，就是老師給起的學名！”

咪咪只有八歲，兩片薄薄的小嘴唇，會說會道，凡事總愛問。她好象什么都知道似的，又向我說：“咱的老師，就是山東大伯。真的！”

山東大伯，是兩年以前來屯里落的戶。他姓魏，听人說是從山東“闖關東”來的，先前在一個大城里住，不知為啥，偏偏搬到這個旁山屯子來。他一口山東話，屯里人都叫他“山東先生”。聽說，他還有個女兒，在城里上學呢。他的女兒什麼模樣，我沒見過。這工夫，我呆在沒蓋成的學房里，幻想着，先跟山東大伯上學，往後再進城上學，象大伯的女兒那樣。越想越高興。

咪咪打哈欠了，才叫着我回家。

小馬架房的泥土還沒干，就開學了。一早，三虎、四

牛、小黑、二娃都来了。最小的要算咪咪。一共十八个穷学生。山东大伯换上了一件旧长袍，修剪了拉茬(chá)满脸的胡子，站在門口用滿口山东腔，跟大人們打招呼。我爷爷从八里鎮买回来一串鞭炮，



吊在門口小桃树上。山屯子头一回办学，男女老少都来看熱鬧。爷爷象是办学的老积极，跑里忙外，还听見他笑盈盈地說，“山边的一群小野馬，上籠头了。托山东先生的福！”

噼噼啪啪一陣鞭炮响，震得桃花飞，人脸笑。山东大伯发給每人一本《百家姓》，又起了学名。山屯里的“土”学校，就这样开课了。

穷孩子讀書特別上心。天不亮，小馬架还黑着，学生都到齐了。誰又想到呢，刚开学十来天，八里鎮的伪鎮长带着大排队^①，气汹汹地闖了进来。冷笑了一声，問山

① 地主武装。

东大伯：“私办学校，为什么不去鎮上立案？”

山东大伯一边讓他坐，一边說：“鎮长，你看这象个学堂嗎？是山屯子亲邻穷湊合，讓孩子学认几个字。”

“眼下的学校，兴念日本文，你們有嗎？”伪鎮长又是冷笑。

山东大伯也嘻嘻地笑了两声說：“鎮长，你是知道的，中国穷孩子，連自己祖先传下的文字都不認識，念什么‘洋文’？会‘洋文’的都干‘洋事’去，誰又肯来教穷孩子！”

伪鎮长象换了猎枪的狼，嚎叫了一声，揮着手，讓大排队砸桌子，撕书。然后帶走了山东大伯。……

过了七八天，爷爷他們赶着爬犁，从鎮上把山东大伯“保”回来。大伯被打得渾身伤，脸上血迹斑斑，眼睛肿着。屯里老的、少的都来看他。

爷爷給他洗着脸上的血，叹口气說：“哎，孩子书沒念几句，就遭了这么大的灾！狗鎮长說，今后再办学，要报告日本人来抓。”

“老哥，別讓他們吓趴了窝。”大伯在炕上支楞着身子說：“天塌下来我頂着，这学非办不行！”他的声音很响。

听着，我心里热辣辣的。山东大伯象块鋼，山也压不碎。又想：这是說的气話，学万万不能再办了。

真沒想到，大伯的伤势刚好，又把学堂操持成了。为了避开八里鎮伪鎮长的耳目，每天吃罢早飯，同學們仨仨



俩俩，挎上挖野菜的小篮，有的背个粪筐，掖着书本，鑽进北山沟。在那里支起了石板小桌，石头小凳。晒着太阳读书，学字。书声，松涛声和大伯爽朗的笑声，融合在荒凉的山谷里。除了下雨，刮大风，每天都来这里上课。

我們这帮穷孩子，是苦水泡大的，不怕苦，不怕难，在这露天的学校里，象先前一样高兴。歇着，就爬山去拣松子，找野果，拾鳥粪，还講抗日联軍打鬼子的故事。不能适应野外生活的是咪咪。她人小，长的瘦，又爱瞌睡，太阳一晒，她就眯着眼，呼呼地睡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大伯常常背她一段路。渐渐地，她也习惯了。

这就是我們的“游击小学”。

二

第二年夏天，一場灾难又来了。鬼子兵下令归大屯，强逼着山边小屯的人家，统统搬进据点附近的大屯去。进了大屯，各家还要实行“連环保”。一家“通匪”（指抗日联軍），十家灭門。乡亲们都把归大屯叫进“人圈”。誰都不愿搬家，鬼子一来，就逃进山。我們的“游击小学”，更是不离山林。每天一早进山，天黑回屯。

那一天，我們一早鑽进北山沟，刚刚在石板桌上摊开书本，不知誰叫了一声：“呀！屯子里起火了。”我們爬上沟沿，看見屯子里火光冲天，浓烟滾滾。同学们含着热泪，望着屯子。却不見屯里有人跑出来。

天黑，火才熄灭。跑回屯子，茅草房全沒了，剩下的是一个黑屋框。草垛都变成了灰，树木也烧焦了。不見一个人影。同学们都放声哭起来。叫爹媽，喊奶奶。山东大伯声音顫抖着說：“好孩子，不要哭。屯里人都讓鬼子赶进了大屯。走，回山去！”

这一夜，我們住在山沟里，盼望屯里能跑回一个人。天还没亮，山下响起枪声，鬼子搜山来了。山东大伯領着我們鑽进老林，跑啊，跑啊，一直跑到天黑，才在一片林子里停下。衣服都划破了，又沒得东西吃，象一窝小燕，围

在大伯身旁。咪咪嚼着茅根草，依在我腿上疲乏地睡了。山东大伯抽着旱烟，象是自言自語，又象是安慰我們說：“咱們找到联軍就好了！”

歇了一夜，第二天拣了些松子吃着，山东大伯又領着往老林里走。沒有路，滿地是烂树叶、枯枝，我們跌跌撞撞地又走了半天，忽然看見那边林里冒出縷縷炊烟，传来輕快的歌声。山东大伯高兴地說：“娃儿們，快走，找到联軍的密营了！”

每个人都长了精神，向着歌声奔跑。真的是联軍的密营。有草棚，有馬架子房，还有帆布帐篷。好多挂棍的，包头的联軍叔叔跑上来，热情地問我們話。有的还認識山东大伯。不一会，跑来一个女兵，紅里透黑的脸上，閃着一双笑咪咪的眼睛。軍衣，軍帽，綁腿，一双草鞋。皮帶上挎支小枪，紅綢包着。她走到山东大伯近前，低声叫道：“爹！”

真奇怪，她怎么叫爹呢？是我听錯了，还是联軍都兴这个称呼？山东大伯對我們招招手說：“都来認識一下。这就是你們的玲姐。”

啊呀，原来玲姐在这儿，不是在城里上学！趁她們父女俩說話的工夫，我悄声問三虎：“你說奇怪不，从前听說玲姐在城里上学，她怎么跑到联軍来了。”

三虎大眼睛一轉，悄声說：“懂哩，屯里传的不是实

話，那是放的风。你看，大伯跟联軍这么熟，他一准是个干联軍地下工作的。……”

我这个不会拐弯的实心眼，讓三虎几句话給戳通了。好象突然明白了，山东大伯为什么对八里鎮的狗鎮长那么硬，为什么办学，又为什么能把我們領到这儿来。……

兴許因为玲姐是大伯的女儿，我們头一次見面，对她就很亲。咪咪拉住她的手，摸摸她的小手枪，尖声細气地說：“玲姐姐，你这小枪能打远嗎？打得过鬼子的大枪嗎？”

玲姐被她的話逗得笑起来。她摸着咪咪的小辮說：“小妹，你叫什么名？”

“小名叫咪咪，学名叫金兰。是大伯給起的。真的。”

“她还叫磕头虫。”我說了一句。“是我妹妹。”

三虎、四牛、小黑都围上去，告訴玲姐自己的名字。玲姐真有点神通，好象我們每个人的家庭她都了解，她向我們說：“咱們都是一个屯的。你們都不認識我，我可知道你們。咪咪还有个老爷爷，四牛家里还有棵石榴树。三虎家在小黑隔院……。”她把全屯几乎数了一遍，还知道我們的游击小学怎么办的。我想，玲姐准是到过屯里。

玲姐对鬼子烧房归屯，不怎么惊奇。她安慰了大家一番，末后說：“小鬼子沒有翻天提地的本事。你們別怕。屯子烧了，咱盖新的。人抓走了，会出来。你們先住下吧。”說着就跑去弄飯，操持住的地方。

吃飽飯，我們鑽進一個草棚里，躺在樹葉鋪的炕上，呼呼地睡着了。

過了一天，山東大伯把我們叫到身旁說：“娃兒，家里人沒個下落，我得去打聽打聽。你們留在这里，听玲姐的話。我找到屯里人，就回來。”听他這麼說，我心里很是感激。山東大伯真是個好大伯，為了我們，他刀山敢上，火海不怕。

送走大伯，玲姐領來兩個護士大姐，說是要幫我們收拾一下。她們一齊動手，給咪咪梳小辮，給三虎和我理發，給衣服破的人縫補。半個上午，把我們收拾的象個人了。下午，玲姐看我們大都打赤腳，就又找來些馬蘭草、破衣服，教我們打草鞋。大家圍上玲姐，很快就學會了。特別是三虎，打的結實又好看。

玲姐說：“打草鞋，也是一課！”

“這算什么課？”咪咪說，她還是那么愛多嘴。“大伯給上課，是教認字！”

玲姐又說：“當學生，不光要學認字，要學懂道理，學怎麼做人，做一個有用的人。字認下八大筐，連雙草鞋也不會打，不會解決生活中的困難，那有什么用？”她給我們講怎麼做一個有用的人。又給說革命、抗日救國的道理。說得大家直樂。

“玲姐，”咪咪忽然問道：“俺在家聽說你也在上學



呢！”

玲姐抿着嘴，笑笑說：“我就是上学呀！上的是青山大学！”

“青山大学在哪儿？”跟我一样实心眼的四牛，瓮声瓮气地問，“念‘洋’文嗎？”

玲姐真会逗人，手往漫山遍野一划，也不笑，說道：“青山大学就在这儿！天大的学房，地大的黑板，念的是共产主义……”

一陣輕快的笑声，打断了玲姐的話。我們后来才懂，玲姐說的不是笑話，革命的部队，就是一所大学。

三

玲姐是密营医院的指导員，那几天正送伤员出院，她又要領人去山外背粮，沒有工夫多管我們。怕我們乱跑，白废了時間，天天讓一个腿上負伤的叔叔給我們講故事，教唱歌。不出三天，我們就熟悉了。这个草棚串，那个帐篷玩。有的叔叔，送給我們个歌本，有的送个用樺树皮做的小本本。听說樺树皮能代替“紙”，三虎領着去剝树皮，我們就自己做本本。

这天，玲姐去山外背粮回来，拿着一把鉛笔，笑盈盈地向我們說：“看，我給你們帶回了最好的东西！”

“铅笔，铅笔！”我們高兴地叫着。

可是，只有十二支。玲姐象早就想好了，拿小刀一支支切断，分給我們。每人一截，还多出三支。我們从前使毛笔，沒用过铅笔，分到半支，象得了宝物。怕丢了，每人都找根线，把铅笔头上割道印，拴在衣扣上。在胸前蹦蹦跳跳，活象拴一只小蚂蚱。玲姐說，这老林里沒个鋪子沒个店，紙笔困难，好容易找人买了那十二支铅笔。每人再做一支“木笔”。学生字，先在地上用“木笔”写，会写了，再往本本上抄。我們又各自做了支“木笔”——就是一根削尖头的小棍。玲姐說，抗联的好多同志，刚参軍的时候，一个字不認識，他們就用这种不花錢的“木笔”和桦树皮本本，学会了写信，摘掉了文盲的帽子。

“游击小学”，又在这里开课了。玲姐成了我們的“校长”兼老师。我还清楚地記得，她給上第一課的情景：大家并排坐在一棵紅松底下，玲姐扛来一块桌面大的青石板，靠在树上。她找了块白粉石，写下了四个大字。問我們：“認識嗎？”

“認識！共——产——主——义——”大家齐声嚷着。

玲姐說：“光会认还不算，怎么講？”

把我們都問住了。玲姐就講起来：共产主义，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，到那时，沒有剝削，沒有人压迫人。……